



随笔

## 吃早饭

王祥夫 文/图

在乡下,如果没有没有什么农活的话一般吃两顿饭,那么“一日三餐”这句话就有些不对头,其实一日两餐也是好的,一是可以睡懒觉,既然不用出去做什么活,那就索性放开大睡。睡懒觉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少吃一顿饭。

人们常说的一日三餐,早上这一顿饭肯定是免不了的。早上这一顿饭最丰富的当数广东的“早茶”,虽说是早茶,感觉要比中餐和晚餐都丰富,即以这个早茶为例,不少人一边吃早茶一边聊天,不觉已是中午,那么就接着再吃中午饭,一边吃着茶点一边喝茶不觉已是黄昏,那么晚饭就再接着来。我真是向往这种生活,但这种生活总是与我无缘。也没人催,天天一到六点半我就会醒来,然后是洗漱,然后是写几张元素纸的字,我习惯用的元素纸是那种一尺半见方的小纸,写完字接着是要画一张两三尺的画儿,即以梅花来说,基本是很快就可以画完,张在壁上坐在那里左看右看然后再把它收拾一下,而山水就要一遍一遍地来,画七遍八遍是常有的事。然后才是吃早饭,我的早饭向来简单,两颗白煮蛋,一个烧饼,就一小碟子咸菜或者是来一块豆腐乳,这就很好了,如果有培根,我会给自己煎五六片培根。

北方吃早饭好像没有起锅炒菜的事,喝粥是经常的事,就咸鸭蛋或腌了不久的咸鸡蛋,有那么一点咸味就行。在北京,早上我喜欢给自己来碗卤煮火烧,或者是来碗炒肝儿,吃炒肝儿必配两个北京的那种麻酱小烧饼,如果忽然不想再吃这两样,那就来碗豆腐脑儿,多浇些韭菜花和辣椒油,真是刺激,豆腐脑要配油条,刚炸出来的油条。总之,一碗豆腐脑、一颗茶叶蛋、两根刚出锅的油条,这顿早饭不赖。早饭吃包子我不太喜欢,如果吃包子最好就来碗稀汤寡水的蛋花汤,里边有一两片西红柿,有几丝蛋花,没什么好喝,但吃包子就宜配这么碗寡汤。

在冬天的时候,去太原街头吃早餐,那绝对是“头脑”第一,稠稠的那么一大碗,里边有块儿羊肉,很大一块,而且是很肥的那么一块儿,还有一两截子长山药,还有藕片,吃的时候在里边浇两杯黄酒,还有和“头脑”相配的是那种黑不溜秋的整根腌韭菜,那可真够咸,但配着“头脑”吃就是要它咸。

与“头脑”相对应的我以为最好的是河南的胡辣汤。那年出国,坐飞机回来,到了吃饭的时候,照例是每人一份地送上来,经常坐飞机的人会对这种东西没一点点胃口,这时就听见一个乘客小声问空姐有没有方便面?想不到居然有,空姐很快就把泡好的方便面送了过来。这时就有一个河南口音的乘客也说话了,他急切地问,有没有胡辣汤?他是太想念胡辣汤了。在河南郑州,女作家邵丽带我们几个人去吃“暖水瓶胡辣汤”,这家店的胡辣汤都是一暖水瓶一暖水瓶地卖,客人可以把整瓶整瓶的胡辣汤直接提走。这个胡辣汤好不好?说实在话可真是好!吃过那么一回,至今难忘。

我看到许多写林徽因的文章,总想把她往才女加淑女上靠,心是好的,做法并不可取。淑女是给世间普通女子定的规范,等于说,啥事做不成另说,先把这个事做成。常常是,做成了这个事,啥事也做不成了。有才华有个性的女子,生来不是遵循规范的,她们是创造规范,也即创造历史的。

经过这么一场感情风波,住在北京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梁家,进入一个平和安宁也兴旺发达的时期。

**5.太太客厅:北总布胡同三号**

我是学历史的,一说什么总爱说历史环境。说林徽因,更是非得说说那个时期的歷史环境不可。

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,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特

## 重返“两矿”

刘东升

“两矿”是人们对汾西矿务局两渡煤矿的简称。对于“两矿”我是怀有特殊感情的,因为我们父子俩都曾是“两矿”的职工。父亲是建矿时首批入职的老工人,上世纪60年代因工伤离岗,上世纪80年代由我接班。虽然两年后我考入干部体制告别了第一份职业,但短短两年多时光,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

1980年底,18岁的我接替工伤父亲到两渡矿崔家沟井口上班。当时,我们几十个十七八岁的工友就挤在职工礼堂打地铺。矿区与两渡古镇结合,形成了一种繁华的城镇气息:电影院常有新片上映,商店里货品丰富,女孩们穿着打扮比年画上还好看。

又瘦又小的我没见过世面,加上一副未脱稚气的娃娃脸,在五大

三粗的矿工中间很像未成年。有一次排队到食堂窗口,售餐的烫发女收了饭票却晾我一旁招呼下一位。我一催,她便脆快地回我一句“姐姐!”我红着脸低声叫了声“姐”,她“哎”音没落地就给我打上了饭,明显比平时足、满。从此,不论哪个窗口,也不论她们年龄大小,只要我递进饭票,那些“姐”们都串通好似的都给我打得盒盖满钵满。两年间,由于吃得好吃得饱,我的身高快速上蹿,离开时身高已近一米八。

正所谓“人生何处不相逢”。2018年我调介休工作后,不时和曾经的工友们小聚,有次去了市内棚户区一个路边小饭店,竟和当年两渡矿食堂窗口第一次逼我叫姐的烫发女不期而遇,她正是这家饭店的老板娘。38年过去了,我们依然

还能认出对方,她突然收起笑容,还像当年那样绷着脸让我叫姐,我喊了一声“姐”,便情不自禁地来了个紧紧的拥抱,让周围人包括她丈夫都深受感染。

2020年11月4日下午,我与一些朋友重返汾西矿务局。我想再进一次矿井,再看一看这个令我终生难忘的矿井。

40年前发黑的泡澡池已被淋浴器和清亮的水池代替。单是更衣室环境已让我兴奋不已。入井后的坑道是拱型,30度角下至650米处再抬升,约100米处下到井下,只见地面干净整洁,坑道内有宣传安全的壁画,有“安全为天,家人盼归”的标语等。下了人井吊轮,就到了进入多个工作面的吊轮转换区,或近或远,根据标志路线图即可到达,不像我们当年,到工作面全是徒步。

入井的工友,坐在吊轮上,灯光下一个个人精神饱满,能看出有年轻,有老工友,有的还友好地抬手和我这个陌生人打招呼。

出井后,阳光西沉,秋风瑟瑟,忽觉眼角发凉,伸手擦去,方知是泪水在眼眶边打转。

乡恋

## 当时已惘然

乔傲龙

乡宁当时有两所初中,出了西门桥是一中,城东的鄂河大桥南面是二中。我到了乡宁二中,时间是1983年。

三年间我始终在这个“小洗脸盆”里兴风作浪。任课老师不用说,连校长樊宪礼、书记赵志英都知道个头矮小的我。期末考完,校园里碰上樊校长,总是先送一个“严肃+失望+惊讶”的复杂表情包,抿着嘴、歪过头,盯住看好半天,这才开始一字一句地恨铁不成钢:“咋闹的你这回,考得这么差?”赵书记这人笑点低,很快便绷不住严肃,开始在一旁哈哈大笑。这种事情宁可信其有,不能信其无,于是跑去问老师,说“校长团你哩,卷子还没判完”,我这才释然。但这老汉总是故技重演,如此这般地逗了我三年,我心知是诈,却不敢完全大意,每次都配合得默契。

樊赵两人关系融洽,办公室的窑洞紧挨着,出入总也如影随形。一晃几十年,当时的情形历历在目,而樊校长几年前早已作古,赵书记身板硬朗依旧,八十多岁的人,酒还能喝不少。

每个期末的表彰大会是全校最隆重的盛典,师生全体参加,校长发表讲话,南山脚下的大操场上,黑压



张朝曦 作

压一片全是人头,扩音器的声波撞上南山又被弹回,颤抖的回音在风里飘出老远。每个年级七个班,从第一名到第十名都有奖学金,第一名十五元,退后一名则递减一元。三年六个期末,有一次被高年级留下来的关引娣同学横刀立马,夺走了我的十五元,其他五次均未失手。每次的奖学金先给爷爷买瓶

酒,剩下的足够下个学期零花。

高光时刻就这样持续了三年,第二名始终在安全距离之外,很难对我的领跑地位造成实质性威胁。那三年,习惯了举目无敌的我,心中早已飘然自负,井底之蛙一样的关门自嗨,忘记了隔壁还有强大的一中,远处更有辽阔的世界。持此妄念,必栽跟头,此是天理。

其实警告性的暗示并非没有,只是自己选择了忽略。有一年,临汾地区组织数学竞赛,我代表二中披挂远征,结果考出了可耻的二十多分。如果全地区的选手都是我这个水平,也许是出题的人有问题,但这种可能性比天塌下来的概率都低,合理的解释是:山区各县的教育水平,整体上与平川地区相去甚远。

遗憾的是当时的我并不喜欢真相,只相信愿意相信的,不能接受的则假装不存在,所以二十多分的耻辱和潜藏其中的危机很快被赶出脑海。直到上了高中,才意识到当年所谓宏图霸业,不过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海市蜃楼。人之可怜可悲,莫过于自欺和自慰,真不知小小年纪,哪来那么多的虚荣,也许独孤求败的感觉实在太美妙了吧。

“好梦必醒,盛筵必散。登场而预有下场之感,热闹中早含萧索矣!”多年后读钱锺书对李商隐《锦瑟》的这段解释,反躬自省,但觉句句扎心。而今乐事他年泪,可叹当时已惘然。

## 连载

24

韩石山 著

■ 华文出版社



虽然成立了,还没有毕业生,是从社会上招考的,胡适就是第二批的清华留美学生。等到有了正式的毕业生之后,每年一毕业,就去美国留学,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二年级上学。每一期都有好几十人。

同时自费留学欧美的学生也多了起来。不管是公派的,还是自费的,学成之后基本上回到国内做事。等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,这批人大都成了气候,分布在社会的各个重要领域,有的在大学教书,有的在研究机构做事,有的在政府重要部门任职,并不是固定在一个领域,可以说随时都可能“出将入相”,比如王世杰这个人,原是北京大学的法学院教授,南京政府成立后,就当了法制局的局长,过了两三年又当了武汉大学的校长,过了三四年,又当了教育部的部长。这个群体,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。学问好,品质好,能力强,待遇高,做事方式乃至生活方式,也是偏西方化的。

梁思成家的“太太客厅”,

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的一个文化沙龙。

这是大的社会环境,还得说到时势。时势造英雄,英雄造时势,这也跟鸡和蛋一样,是鸡生蛋,还是蛋生鸡,总也纠缠不清。要叫我说,两者是相互影响、相互生成的关系。若要分个因果,该说是时势给了英雄以空间,英雄的作为又让这个空间充实起来,成为真正的时势。上世纪20年代,就是1921年到1930年这十年间,文化人有两次大规模的南移,一次是1924年张作霖占据北京,实行严厉而又困窘的统治,新闻文化机构遭到抵制,大学教授被一再降薪,致使许多文化人南下,去人最多的地方是上海。新月社一班人,就是这样集中在上海的。

随笔